

■学人素描

戴利:主流经济学的叛逆者

◎史晨昱

如果把主流经济学比作一种宗教,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无异于一名异教徒。19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古典学派所开创的“关于效用和自利的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在很多大学和研究生院里,经济学已被更多地当作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门社会科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经济过程和物质环境之间存在的持续相互影响,已不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值得庆幸的是,主流经济学的机械教条并没有被所有经济学家信奉,以戴利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不懈探索着生态与经济的相互关系。



继续维持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再是合理的选择。这时,人类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越了由环境再生和吸收能力决定的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必然导致环境危机的出现,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将难以维系。此时,人类必须停止物质资源流量的继续增长,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张(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增长这个硬核必须放在坚硬的生物物理事实之上,然后用道德的锤子砸碎。关注后代、关注人类和目前财富分配中的不公平,则提供了这把道德铁锤。”基于此,可持续发展只有在被理解成“没有增长的发展时——即在地球生态系统生成和吸收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一个由物质-能量产生所支持的持续稳定的物质经济基础和数量改善”,对经济才有意义。

可持续发展观

1987年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首次在报告中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WCED的定义尽管内容不是空泛的,但对什么是发展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仅仅告诉我们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什么。此后,可持续发展研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提出了迥然相异的多种定义,但大多缺乏明确的内涵。戴利风趣地说“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人人喜欢但没有人能明确其含义的词。”那么,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呢?戴利在区分了增长与发展的不同实质的基础上,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经济增长一般定义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可以将其划分为数量性的物质组成(资源流量增长)和质量性的非物质组成(资源效率改进)。当人类的经济规模相对于既定的、非增长的、封闭的生态系统来说很小的时候(如农业社会),资源流量增长是主要的,而资源效率改进居于次要地位。当人类的经济规模相对于生态系统来说很大的时候,

可持续发展研究看似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繁荣无法掩饰其致命缺陷,那便是没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学基础。由于找不到相应的经济学落脚点、立足点和出发点,在该分析的基础上,戴利1990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操作性原则,认为只要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遵循这三个原则,那么就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即:(1)所有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利用水平应当小于等于种群增长率,即利用水平不应超过再生能力。(2)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应当低于自然界的净化能力。(3)将不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获得的收益区分为收入部分和资本保留部分,作为资本保留的部分用来投资于可再生的替代性资源,以便不可再生资源耗尽时有足够的资源替代使用,从而维持人类的持久生存。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基础

可持续发展研究看似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繁荣无法掩饰其致命缺陷,那便是没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学基础。由于找不到相应的经济学落脚点、立足点和出发点,

可持续发展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对现状的描述、对数据的罗列、对未来的担忧以及理想的、空泛的、应然性的政策分析上,最终导致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人类行为(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之间的不可避免而又令人心痛的断裂。

主流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决定了无法胜任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经济学基础。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有效地配置给相互竞争的用途的科学,自从莱昂内尔·罗宾斯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于1935年问世以来,这个定义就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对这一学科来说,稀缺性是出发点,但这一点到稀缺性本身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件幸事。在戴利看来,稀缺可以区分为相对稀缺和绝对稀缺。前者指的是自然资源相对于人类的无限欲望所表现出来的稀少性和不足,后者是就自然资源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物理属性所表现出来的稀少性和不足。虽然也有生产可能性曲线、效用可能性曲线等限制性条件,但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模型中稀缺性更多的是指相对稀缺性而不是绝对稀缺性,即资源是稀缺的但并不会枯竭。简而言之,主流经济学只关心如何最大化、高效率地配置和利用现有稀缺性资源,而不是从源头上关心是否永远有足够的稀缺性资源可供配置和利用,更不会面向未来前瞻性地去关注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配置问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针对主流经济学在环境问题上的传统缺失,1996年戴利出版了集学术生涯大成之《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在著作中,戴利建立了一种与主流经济发展观迥然有别的新理论框架——宏观环境经济学,对包括国民账户消费、贫穷、人口、国际贸易乃至宗教伦理等在内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追本溯源的再思考。学术界认为其是对主流经济学发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导者。

根据戴利的观点,经济系统中存在三个根本性的经济问题——配置(效率)、分配(公平)和规模(可持续性)。“经济学家们已经意识到高效配置和公平分配是两个独立的目标,同时他们也大体上认同最好用价格来反映效率,而用收入分配政策来反映公平。最佳规模是第三种政策手段。”那么,什么是规模?什么样的规模是最佳的呢?“规

模”这一术语是“人口乘以人均资源使用量而得出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生存的物理规模或尺寸”的缩写。主流经济学范式将经济系统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可以不依赖除它以外的任何东西而无限膨胀。因此,经济规模越大越好。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经济系统作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必然受到环境再生和吸收能力的约束。经济系统相对于生态系统必然存在一个最佳规模,既不超越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同时又能够为人类生存带来持久的、最大化的福利。

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和吸收能力共同决定了规模具有最大值,然而最大的规模并不一定是最佳规模。根据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于企业来说,在其可能的最大规模之前,往往存在着一个最优规模,此时,企业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而最大规模则可能是反经济的。微观的配置问题类似于将既定重量最合理地分配在一条船上。尽管重量可以被分配,但仍存在船究竟可以承受多大净重的问题。这一绝对最佳载重量在海事制度中被称为装载线。当水位标志达到装载线时船就达到了安全承重能力的极限。当然若重量分配不当,水位线就会提前达到装载线。当然,即使重量被合理分配,如果载重过大,以最佳方式分配重量的船也仍将沉没。戴利指出,微观经济学给予的启示是,扩大所研究行为的规模直至边际成本恰好等于边际收益,这就是给最佳规模下定义的条件。戴利将经济的最佳规模形象的比喻为“经济装载线”,

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适当的定义和计量社会整体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进而“设计出经济装载线,用以确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

针对传统发展模式导致的生态危机,戴利提出了稳态经济思想,实质是将资源流量控制在生态可持续的范围内,然后提高经济系统的效率,“而来源于技术知识的改善或是对目标的更深理解,由既定流量规模构成的使用中的性能改善,被称之为发展。所以,稳态经济能够发展,却不能增长”。

激进的改革派

一直以来,戴利的生态经济理论与主流经济学迥然相异,他本人也被视为经济学界的一个奥德赛式人物。1988年至1994年,戴利一度作为一名高级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环境部工作。虽然戴利成功地使世行在政策和项目中关注环境问题,但他的生态经济理论却一直难以说服同僚。最终,因不满官僚作风和陈腐方针,戴利离开了世行,转就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任教。这标志着戴利从最初的信仰者演变为激进的改革派,与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分道扬镳。

戴利就像一个在荒野之中大声疾呼的无名英雄。虽然难以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但却鼓舞和带动了新一代经济学家和环境论者。他播下的思想种子,必将在未来生根发芽,成长为茂密辽阔的森林。

■本期人物话舌



国资向能源军工行业集中态势明显

李荣融(国资委主任)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称,四年多来,针对中央企业行业分布过宽,部分企业主业过多、主业方向不明,资源配置不合理,资产运营效率不高等问题,国资委以核定主业和推进联合重组为主线,推进中央企业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目前,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国有资本向能源、原材料、交通、军工、重大装备制造和冶金等行业集中的态势明显。

■多声道

社保基金海外投资不会因次债风波止步

项怀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18日在深圳参加2007资本中国年会时对媒体表示,目前正在发生的美国次级债风波,可能是1929年美国股灾以来,在美国发生的最大一次金融风波。自美国次级债风波发生以来,美、欧和日央行纷纷投入巨资救市,美国多家次级债公司倒闭,像高盛这样的大投资机构也被卷入,这都表明了美国次级债风波对全球市场的影响不能低估,但社保基金海外投资不会因次级债风波止步。

金融动荡不致引发经济不景气

鲍尔森(美财政部)8月16日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表示,近来美国金融市场出现的骚动将削弱美国的经济增长,但这样的情况不致引发不景气,预期美国经济会持续增长。因为,全球经济基础非常健康,目前是全球经济最强健的时段。金融市场的修正可能会持续,市场骚动会削弱经济增长。不过,经济与市场够强壮,可以吸收损失。

今年中国贸易顺差可能世界第一

于广洲(商务部副部长)8月18日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上表示,贸易顺差在发展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按照目前增速,今年中国贸易顺差很可能世界第一。目前中国出口总量排在德国、美国之后位列世界第三。根据测算,2007年极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德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出口总量与美国差距不足700亿美元。如果以现有增速计算,今年中国出口将可能超过美国500亿美元。

三大内因推动我国投资增长过快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8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上指出,当前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明显偏高,除了发展的阶段性因素外,还受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和投资成本过低等三个内在因素影响。

■经济学术思潮追踪

财政分权理论模型的演进

◎梁怡

政府作为市场行为主体之一,其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历来是经济学家的关注点之一。其中财政分权行为作为政府间竞争与合作的核心体现更是备受学者们关注。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其核心是,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财政分权的好处也显而易见,例如,有利于减少信息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分配的公正性,更有利于财政监督等。

从上个世纪以来,财政分权开始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不光发达国家大部分开始实行财政分权,就连转型经济国家也致力于财政分权的实践。

理论的发展向来是与实践的发展交织相伴,相互促进进行的。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发展,财政分权理论也持续发展。现在学界普遍认同 Tiebout 1956 年的经典文章《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标志着现代财政分权理论的起点,迄今为止,这个理论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的财政分权理论以 C.M. Tiebout、Richard A. Musgrave 和 Oates、W. E. 等学者的理论模型为代表。Tiebout 的“以足投票”模型以公共产品为基点,然后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因为如果政府不能满足居民对公共品的要求,那么居民可以“以足投票”转到带给自己最大满足的地区;因此,在居民的选择压力下,地方政府必须尽力按居民的要求供给公共品,从而实现帕累托效率,而不同地区间的税收水平也会趋向合理。

很显然, Tiebout “以足投票”模型的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物品的竞争理论。这一模型的现实意义在于,它证明了财政分权比集权的效率要高,因为拥有财政自主权的地方政府之间可以展开竞争,而竞争总会产生最优效率。但是这一模型的缺陷也显而易见,首先它忽视了另一市场主体——企业的作用,然后就是其假设过于理想化,例如居民的充分流动性和信息的完备性等,这些在现实世界里是很难具备的。

美国经济学家 Musgrave 则在其 1959 年的经典著作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中首次提出 Public Finance 的概念,并分析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基于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和分配的公正性实现,他证明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必要分权的可行性和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权力的必要性。

奥茨(Oates)在 1972 年的 Fiscal Federalism 一书中,吸收 Tiebout 模型的特点,阐述了著名的奥茨“分权定理”。他以流动性资本为研究对象,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品的比较优势。但 Oates 模型的缺陷同样显而易见,由于资本流动是依附于企业和居民这两大主体的经济行为,但他只研究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却忽视了居民的消费和择业行为;最重要的是,Oates 模型缺乏实证依据。

总的看来,在第一阶段中,学者们的观点实质是强调地方政府竞争机制的作用,这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是相一致的,但忽视了对政府激励机制的研究。

在第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将当代微观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引入到财政学研究中,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上引入了激励相容与机制设计学说。学者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设计出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实现对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激励。这极大地弥补了第一阶段中理论模型的不足。

第二阶段的财政分权理论,以中国经济学家钱颖一分别与 G. Roland 和 Barry R. Weingast 合作的论文为代表。他们的研究假定,政府并不是类似于普度众生的救世主式的普善机构,政府官员也有物质利益,有可能从政治决策中寻租;因此,有效的政府结构应实现对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地方居民福利的相容。他们还探讨了财政联邦主义的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指出联邦主义政策的可持续性有助于政府可靠地维护市场,但其前提是政府具有自我强制机制,且政府官员必须有遵守联邦主义规则的激励。

第二阶段的财政分权理论,因其假设与现实情况更接近,因而对现实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

从未来的发展潮流来看,财政分权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而对分权理论的研究也已超出了财政领域,学者们越来越关注财政分权对其他社会、经济的影响。

由于财政分权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单纯强调绝对分权或绝对集权体制的说法都是不科学的,而是应当通过集中与分散、集权与分权格局的合理设定,使财政体制的运行能更和谐、有效,并在恰当界定中央和地方各自职权的同时,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集权的财政体制是不利于制度创新和公共品供给的,我国 1994 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就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慕尼黑随笔

为“老外”做一套奥运“北京卡”如何

◎梁雨霞

北京申奥成功后,许多北京市民开始学习外语,包括一些上了年岁的市民——积极以实际行动为奥运出力,首善之都居民,社会责任感由此可见一斑。

数年过去了,不知道人们是否热情依然,进展如何?如果语言这种东西可以在短时间内突击学好,本人是举手欢呼称颂的。

然而,众所周知,很多国人从小学开始,学到大学毕业,却连起码的日常会话都有困难。按一些人的说法,中国人学的外语,是“哑巴外语”。

满怀热情的居委会大妈和出租车兄弟们,如果把学习外语当成一种脑力体操,倒也其乐融融。然而,若只是为了不给国家“丢脸”,比如,为了能在老外“内急”的时候,给行个方便指条路什么的,可就太委屈同胞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几年辛苦的结果,可能很难派上用场。因为各国文化不同,不同场合的“社交语言”也不同,比如,“如厕”这样简单事情,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以英语为例,一个美国人通常会问, restroom(休息室)在哪里?一个英国女士或许会说,我要给鼻子扑点粉,请问地方在哪里?一个德国人会直接地说, Toilette 在哪里?

事实上,很多语言上的“问题”,都是通过良好的管理来减少的。奥运本来是世界盛会,奥运的精神,应是尽量使人民“有乐同享”,同时,少让百姓“有难同当”。惠民而勿扰民,才是可取的态度。

那么,诸如语言这样的问题,通过怎样的管理方式,才能在短期内解决呢?笔者提出几种不同的方式,供有心人参考。

第一种办法,可以借鉴声讯台的办法,设立“翻译热线”。比如,当出租车司机遇到语言问题而旁边无人帮忙的时候,可以拨打此热线。倘若不是英语,则立即转“小语种服务”,可设置“语言会诊”模式——如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一定会大大提高。

在北京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这样的需求有可能每天都会,尤其是大型会务期间,发生的频率更高,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台,定会让很多司机与窗口部门的人员松了一口气。

既然是服务,就有费用问题。这也不难,解决方案

起码有两套:一、由政府买单,作为一项公益便民措施;二、声讯台实行有偿收费服务,政府补贴一部分,以保证相关的声讯台不因推出这项服务而导致亏损。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旅行社、机票代理机构、航空公司、宾馆等,无偿或有偿地,提供一种特殊的语言服务卡——按照西方的思维习惯,建议干脆叫做“北京卡”。

以宾馆为例,具体的做法是:客人入住时,根据其护照国籍或本人意愿,赠送一套或简单或精致的多语种卡片——姑且叫做“卡片”,当然,也可以是袖珍的簿子,或者其他的样式。

如果客人说英语,就提供一套中英对照的版本。第一张卡片上,可以写上:“请告诉我附近的厕所在哪里?”;第二张卡片上,可以写上:“请告诉我附近的取款机在哪儿?”;第三张卡片上,可以写上:“请带我去涉外医院”——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请求,可少可多,很合适分成不同的版本,甚至还可以针对特殊人群——比如穆斯林、老人或者残疾人等等——设计独特的内容。

卡片的反面,可以是宾馆的广告,可以是本地的风光,可以是旅游常识,可以是幽默内容,等等。

这类小东西,如果设计的构思巧妙,完全可以做到便于携带和应急使用,又具有收藏价值,因此,很适合成为奥运会指定产品。

根据笔者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有理由相信,这个做法会得到所有客人的喜爱,说不定还能够迅速推广到其他国家。

花费不多,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当前的和今后的问题,还可以改善服务和国家形象,同时,又可以宣传文化,何乐而不为?

本文提出的“点子”,既适合政府出面,也适合民间发起,既适合初创者,也适合持币寻找项目的投资人——只是,有心的同胞莫忘及时申请相关国际专利,如果发财,莫忘回馈社会。

奥运会,正在给我们带来各种困难和挑战,对付这一切,首先需要用心,而不是用钱。须知,困难所在,就是需求所在,需求所在,就是市场机遇所在——机遇是具体而微的,机会垂青有心人。

细节决定成败,勿以善小而不为。祝愿北京奥运会成功。